

题记：你有所不知的水电十四局

 鲁甸“8.03”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是谁在付出6条生命和巨额财产损失情况下“刺穿”泄流的？昆明2013年“7.19”北站隧道大洪水是谁抽干的？三峡电站最艰难的地下发电厂房开挖支护是谁完成的？黄河小浪底一号导流洞在国外公司严重耽误工期后，是谁抢工期确保黄河如期截流的？”“亚洲第一土坝”是谁靠人挑肩扛用柳条筐和小推车堆筑起来的？

 这是一个参与京沪高铁、深圳地铁、天津地铁、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喀麦隆拉格都水电站、厄瓜多尔、斯里兰卡等10余个亚非拉国家工程建设的中央企业；

 这是一个亲自书写“鲁布革冲击”历史的主角，这是一个在行业内以“地下铁军”的赫赫声名和辉煌业绩震惊世界的明星企业。

 以上挂一漏万的提示，所指向的角儿就是中国水电十四局。 今天是鲁甸“8.03”地震一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告慰大地震抢险而牺牲的十四局6位职工，向61年来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水电十四局广大职工表示深深的敬意。

“夜秘密地把花开放了，却让那白日去领受谢词”

 43岁的范开平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嚎啕大哭。

 这是2014年8月10日上午11时许。 就在此前11日正午，水电十四局曲靖分公司经理范开平带着司机王2.4吨咋炸岩将位于牛栏江的红石岩水电站碾压并施工支洞直至高达1.8米的钢管架兰盘堆垛炸开，使得水头高达70多米，蓄水量多达2.6亿方米的红石岩堰塞湖溃决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不是因为鲁甸，不是因为悲伤，不是因为高兴，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想解释沉积在心里的压力，我当时快崩溃了。”

 2015年7月25日上午，周六，在水电十四局办公楼411楼的党委工作部办公室内，每周一至2014年鲁甸“8.03”地震抢险救援，范开平总是语调低沉沉重，眼圈泛红，当时释放的唯一方式是哭，放声痛哭。

 他哭的时候，在场的十四局抢险总指挥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的王耀平同样心情复杂而无奈，“我进了那间房子，去安慰他。”

 2014年8月16日16时30分，云南省鲁甸县龙头山镇发生6.5级地震。

 截至8月8日15时，地震共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受伤，3143人受伤。

 这场地震，直接造成的危害后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震中龙头山镇大量民房倒塌，死伤累累。另一个就是地震导致金沙江支流牛栏江两岸的大石岩堰塞湖。

 到8月9日，堰塞湖已经蓄水2.6亿立方米，对下游的3万多名群众、两座水电站和几座公路桥梁以及大量农田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不期待这个‘神童’，其次鲁甸无法可避免。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决定利用新建水电站时的施工支洞，从湖底泄湖”。

 灾难发生后，鲁甸在各种安全检查救援中表现优秀的水电十四局被云南省政府紧急调遣奔赴鲁甸抢险，当时公司总经理王耀平等多名出差，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范开平以及副总兼总工程师等领导带着抢险队先鋒队和设备于8月4日到达震害发生地，参与救援。

 从这以后直到8月15日，王耀平都坚守在第一线。

 “鲁甸‘穿刺堰塞湖’的艰巨重任后，王耀平又急需曲靖分公司经理范开平回来协助“穿刺堰塞湖”的“钢钎”角色。

 “根据我们的施工经验，判断此时这个电站建设时应应该有一个施工支洞，找到这个支洞，用炸药将支洞炸开一个，然后利用这个支洞泄湖。”

 现任十四局曲靖分公司红石岩工程项目部常务副经理2014年“8.03”地震抢险救援时，王耀平说：“一雷声惊响，洞子、堵头炸开了，这是一个直径为180厘米的洞，堵头厚约2.6厘米的钢板架，刚用炸药就固定了。”

 堵头一炸到，爆破方案就确定了，“确定8月9日当天炸开，炸开这个堵头需要炸药2.4吨。”

 “当时范开平，首先拿出上级报告溺水事故及其所形成的灾情，”经过10多天搜集，找到7处正在施工的水电站，”经过10多天搜集，找到了正在大坝桥面汇西江面堰塞湖的工地找到了龚有祥。”

 2015年4月7日，在下游天板电站库区江边树林里找到龚有祥，其余4人至今下落不明。

 “当时参与固结炸药，现任曲靖分公司红石岩工程项目部副经理刘理道，”在“压力作用下，钢管架头不时发生晃动，螺旋绳陷入了临界状态，情况十分危险；钢管架与混凝土外露70公分，太短了，我们透过压力水幕，将2000多米炸药塞入一圈地堰塞湖钢筋网管外，将2400公吨一体化炸药码在钢管圈周，必须忍受压力水幕在身上和脚下刺……”

 11点，一声巨响，大地震颤，须臾之间，昔日施工支洞此时宛如“水花四散”，将一柱洪流喷射到牛栏江上，水花飞溅，巨震轰鸣。

 “这个堵头一炸开，涌出流量每秒达到至少80立方米，通过支洞所释放的水量和进入牛栏江的水量相当，堰塞湖的水位也没有上升过，对堰塞湖的威胁大大减弱。”与马红约说，“炸开堵头，我以为可以这样了。”与马红约说，“我们开始收拾行李，这时，接到一个电话，



“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水电十四局“后鲁布革”时代30年蝉蜕史

文/陈昌吉 冉路超 黄楠 图/水电十四局



公司总经理洪涛(右一)和喀麦隆国家总理在该国施工现场

置并使用了这种设备。

 是年，水电十四局54岁，装备已经从锄头、挑筐、独轮车、手碾子等变成了架桥机、架桥机、挖掘机、装载机等等。

 锄头、挑筐和磨杓机、架桥机，都是十四局的财富，代表了它的历史和现实。

 “这个75米x75米深的洞子，长达287米，正常情况至少要3个月才能打通，现在要我们20天打通，怎么可能？”范开平说，“而且当时什么设备都没有，有的要从外地调，有的要买空。空压机我叫人从深圳买美国进口的，‘快通’来鲁甸。”

 8月12日，应急泄流洞出口正式开工。

 从8月12日开始工作，直到9月4日之前，洞子总体上一直打得很顺利，但距终点还有7米时，出现状况了。

 马红约说，“9月24日早上7点我去看，洞子堵了7米，而且顶部还在不停地掉泥土。”

 马红约又返回重庆施工工地的范开平汇报，范开平连夜从重庆开车回应急泄流施工现场，连夜视察察看。

 “洞子随时会塌，我要马红约把所有人员和设备撤出，然后停工两天，请岩土工程和爆破方面的专家来看场，进行了一次论证，专家会诊后提出了一个新方法，要在现场炸退后，浇一个15米厚的堵头，将洞子堵住，然后20米，从旁边挖一个泄洞去连接电站引水隧洞。”

 “堵头浇好后，接着按计划开凿泄洞。”

 就在此时，10月3日14:28.6分钟汶川大地震的同时一刻，又发生了一次余震，突然，岩层在水头巨大压力下前涌了，巨大的水流将岩层冲垮为高空坠，快速冲向洞内。

 “我被一个电话救了命，我当时约好和通话。”与马红约说，“洞子没设信号，我就用手机打，电话未拨通，看到洞子里排出来的水明显增加，我就赶紧往里面，那里只有23个人在作业，我想赶紧和他们聚拢去。”

 一会儿人和施工设备都被大水裹挟，被冲刷出来。

 “我被冲到洞口才站稳，这时看到两个人被冲出来，我抓住了一个，另一个眼睛睁着他被冲走。”马红约回忆道，“当时洞内有一辆重达50多吨的水泥罐车也被冲出100多米，冲到大坝车熄了火，有五六个工人抓住车算，算是捡回一条命。”

 “后来罐车还是被冲走，滚到牛栏江里，水砸罐车与车体分离，罐子漂浮在水面，车子则像个踪影都找不着，”刘正说，“仅设备器材，我们直接损失了2000多万元。”

 “清点人数，连马红约在内的24个人，只剩18个人，有6个人不见了。”

 这6个工人是郑建林、龚有祥、颜卫国、钟玉富、王中，各有交代。

 其中，年长46岁的郑建林是十四局职工，其余5人是劳务协作工。

 15时许，马红约电话向上级报告溺水事故及其所形成的灾情，”经过10多天搜集，找到7处正在施工的水电站，”经过10多天搜集，找到了正在大坝桥面汇西江面堰塞湖的工地找到了龚有祥。”

 2015年4月7日，在下游天板电站库区江边树林里找到龚有祥，其余4人至今下落不明。

 “当时参与固结炸药，现任曲靖分公司红石岩工程项目部副经理刘理道，”在“压力作用下，钢管架头不时发生晃动，螺旋绳陷入了临界状态，情况十分危险；钢管架与混凝土外露70公分，太短了，我们透过压力水幕，将2000多米炸药塞入一圈地堰塞湖钢筋网管外，将2400公吨一体化炸药码在钢管圈周，必须忍受压力水幕在身上和脚下刺……”

 11点，一声巨响，大地震颤，须臾之间，昔日施工支洞此时宛如“水花四散”，将一柱洪流喷射到牛栏江上，水花飞溅，巨震轰鸣。

 “这个堵头一炸开，涌出流量每秒达到至少80立方米，通过支洞所释放的水量和进入牛栏江的水量相当，堰塞湖的水位也没有上升过，对堰塞湖的威胁大大减弱。”与马红约说，“炸开堵头，我以为可以这样了。”与马红约说，“我们开始收拾行李，这时，接到一个电话，

“鲁布革冲击”的递进冲击

 出来进行国际施工招标。

 简单地讲，整个鲁布革电站建设分为三大块。首部工程为蓄水发电的大坝，由十四局二公司承建，澳洲专家提供咨询服务。

 中部工程为一条长达9800米的引水隧洞和一段长68.5米、内径13米、衬砌厚度0.65米的调压井，由中标的日本大成公司承建。

 最后工程为尾水发电厂房，由十四局三公司承建，挪威专家提供咨询服务。

 1983年11月，美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法国8个国家承包商。

 争夺中部的工程这块“肥肉”有的中国、日本、挪威、意大利、美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法国8个国家承包商，以人民币8463.60万元中标。大成的投标价比中国与世界公司联合体投标价低人民币3600万元。

 《鲁布革冲击》记载，“在开挖直径8.8米的圆形发电隧洞中，创造出每小时进尺373.7米的国际先进水平……1986年10月30日，隧洞全线贯通，比合同计划提前5个月。”

 作为这个世纪纪录的见证者之一，当时的台车工，现任十四局大理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的陈益才讲述了大成公司的“管理经”，“核心是围绕项目，用经济手段激励工人干活，个人收入和进任务挂钩，再是考核计算简单明晰，每人每天收入多少，人人心中都有数。”

 陈益才作为劳务工人被大成公司录用后，拿国内等级工资，月收入大概50元，一到大成公司，月薪每月就是120元，其他是各种奖金，每个月都有200多元，最多的是1985年3月，那个月他收入高达930多元，当时的最大奖是1元， equal and honest, 东西我装, 我用安全帽装, 装了一满一盆, 相当于我以前一年的总收入。”

 “没有鲁布革大成公司对我们的影响，十四局可能没有今天的辉煌。”陈益才说。

 “鲁布革开创了十四局企业的发展机会，鲁布革引入大企业管理体制，对促进十四局工程施工管理能力提升、管理水平的提升、施工工地的革新, 装备的有效使用, 产生了极其有益的启发。”刘一波说。

 “鲁布革”第一次说招投标，“鲁布革时期时任十四局局长的王耀平最早提出了‘鲁布革’，在此之后，全国大小施工企业开始试行招投标制与合同管理制度，它的反响早已超出了水电系统，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强烈冲击。

 在日本的管理经验令刘一波印象深刻，“他那时值得佩服的许多几亿的‘双’轿儿。”

 “这是聚能公司已建和在建风电场的一部分，鲁布革公司总工程师崔晋文说：“鲁布革时期，总装机容量为21.8万千瓦，包含巨龙山、晴山水电站，龙坡上、山顶4个风电场和四川干海子光伏电站，龙上是一个风电场。”

 日本的2008年5月-2010年11月，位于风城下关部的磨房山风电场已经建成投产，磨房山风电场有61台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3.575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9500万度。

 “我们去干小浪底，是在外方顾问组11个月严重的情况下，被派去救火的。”陈益才说，“大埋分公司去了近500人，1996年2月开始施工，1997年9月2日，联营体承接的导流洞全部完工，提前一个月完工。”

 是年10月28日，我河汛期刚结束。

 “十四局的‘小浪底之旅’，在‘鲁布革冲击’的基础上，又写到了新篇章。”

 时任 OTF 联营体董事长的黎汉章曾著文认为，小浪底使得十四局建立了“合同型管理”的雏形，”强化以合同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只有在小浪底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它的作用。”

 “到了小浪底，我觉得我们比外方还强，鲁布革日本工人的表现，没有我在小浪底好。”陈益才说。

 陈益才说，鲁布革“后鲁布革”时代，他和是十四局这两段历史史之以千计职工中的创造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之一。

 现任曲靖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翟永生至少从2008年参加京沪高铁建设以来，翟永生也没干过本行(水电)了。

 “2008年1月，我们进驻山东京沪高铁，驻扎在曲阜林林上。”

 当时翟永生担任京沪高铁十四局二区党委副书记，十四局承建曲阜段的泗河特大桥梁建设，两座连山，全长17.85公里。

 他后来知道说，京沪高铁是中国水电人第一次涉足高速铁路的建设。

 “高铁的起步，是将所谓‘前方’和‘后方’剥离。

 正如在此情势下，加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的背景，十四局当时不得不单枪匹马闯进这一行业，”十四局“放开”的策略，要因地制宜中脱颖而出。

 “鲁布革”时代，鲁布革冲击了十四局内部存在的大问题之一，是企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奉行“企业办社会”困局，作为一个本来应该人才精干、行动敏捷、技能娴熟、资源配置恰当的施工队伍，应该分前而后，不能拖家带口，拖累效率。

 2000年1月28日中午，十四局已经先行归还资源和人员机构，将水电局的一、五、六公司合并成立了大埋分公司，将在滇东的三、四公司合并成为曲靖分局。

 但这也公司的分离只是在设备、人力资源方面有所优化，但公司的依旧面临水土不服，局长是名符其实的“总统”，什么都得管，不仅要管



 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壮大，还要解决诸如职工家里下水道不通、夫妻不睦、纠缠上访等等难题。大埋分局的局长由时任十四局党委副书记、现任水电十六局局长的林文进担任，十四局大理管理部主任任文培讲了“一个小故事”。

 “某职工为自己的事跑来找林局长上访，他一来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林局长就没法办事，只能听他叨叨，后来老这样，局长头疼了，听说这位职工又来了，他就一溜烟儿闪了。”

 “杜文裕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不是大埋分局的特例，而是整个十四局的共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十四局那说发展，能存活就不行了。”

 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问题被时任局领导意识到非改不可了。

 2000年1月，十四局分别在大理、曲靖、昆明设立了劳务中心和离退休管理中心，同年4月，设立了大理曲靖培训基地。

 这一举措，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关系，使生产经营和社会职能彻底分离，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

 2007年2月，再次对社会职能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撤销属于相关部门的社保中心和昆明、曲靖、大理的离退休管理中心和劳务中心，成立昆明、曲靖、大理3个管理处，统管所有后方事务，再次减少后方管理人员56。”

 全局人员，除少数教育、卫生人员外，其余的均进入劳务管理中心(管理)，项目部自用人员则根据自己的需求，从劳务中心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

 昆明管理处有工作人员31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3992名；曲靖管理处工作人员56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2.9万人；大理管理处工作人员

 陈益才说，鲁布革“后鲁布革”时代，他和是十四局这两段历史史之以千计职工中的创造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之一。

 7月23日上午的大理，天蓝中还真有一朵“朵”雨做的云。”

 “早半年后，一场暴雨降大地，雨中的风将巨大的水泥管，一根柱粗巨大的白色铝柱矗立山巅，它顶着上大的3片紫叶呼呼作响，似乎想把那暴雨的浓雾驱走，好让世人一睹它的伟岸与巨硕。”

 “鲁布革”第一次说招投标，“鲁布革时期时任十四局局长的王耀平最早提出了‘鲁布革’，在此之后，全国大小施工企业开始试行招投标制与合同管理制度，它的反响早已超出了水电系统，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强烈冲击。

 在日本的管理经验令刘一波印象深刻，“他那时值得佩服的许多几亿的‘双’轿儿。”

 “这是聚能公司已建和在建风电场的一部分，鲁布革公司总工程师崔晋文说：“鲁布革时期，总装机容量为21.8万千瓦，包含巨龙山、晴山水电站，龙坡上、山顶4个风电场和四川干海子光伏电站，龙上是一个风电场。”

 李庆祥11月，兼能电力于王耀平的大力推进。“2007年11月，聚能公司成立，王书记受局党委委托，兼任十四局常务副经理宋宇波。”

 “鲁布革”时代，鲁布革冲击了十四局内部存在的大问题之一，是企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奉行“企业办社会”困局，作为一个本来应该人才精干、行动敏捷、技能娴熟、资源配置恰当的施工队伍，应该分前而后，不能拖家带口，拖累效率。

 2000年1月28日中午，十四局已经先行归还资源和人员机构，将水电局的一、五、六公司合并成立了大埋分公司，将在滇东的三、四公司合并成为曲靖分局。

 但这也公司的分离只是在设备、人力资源方面有所优化，但公司的依旧面临水土不服，局长是名符其实的“总统”，什么都得管，不仅要管

 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壮大，还要解决诸如职工家里下水道不通、夫妻不睦、纠缠上访等等难题。大理分局的局长由时任十四局党委副书记、现任水电十六局局长的林文进担任，十四局大理管理部主任任文培讲了“一个小故事”。

 “某职工为自己的事跑来找林局长上访，他一来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林局长就没法办事，只能听他叨叨，后来老这样，局长头疼了，听说这位职工又来了，他就一溜烟儿闪了。”

 “杜文裕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不是大埋分局的特例，而是整个十四局的共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十四局那说发展，能存活就不行了。”

 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问题被时任局领导意识到非改不可了。

 2000年1月，十四局分别在大理、曲靖、昆明设立了劳务中心和离退休管理中心，同年4月，设立了大理曲靖培训基地。

 这一举措，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关系，使生产经营和社会职能彻底分离，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

 2007年2月，再次对社会职能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撤销属于相关部门的社保中心和昆明、曲靖、大理的离退休管理中心和劳务中心，成立昆明、曲靖、大理3个管理处，统管所有后方事务，再次减少后方管理人员56。”

 全局人员，除少数教育、卫生人员外，其余的均进入劳务管理中心(管理)，项目部自用人员则根据自己的需求，从劳务中心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

 昆明管理处有工作人员31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3992名；曲靖管理处工作人员56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2.9万人；大理管理处工作人员

 陈益才说，鲁布革“后鲁布革”时代，他和是十四局这两段历史史之以千计职工中的创造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之一。

 现任曲靖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翟永生至少从2008年参加京沪高铁建设以来，翟永生也没干过本行(水电)了。

 “2008年1月，我们进驻山东京沪高铁，驻扎在曲阜林林上。”

 当时翟永生担任京沪高铁十四局二区党委副书记，十四局承建曲阜段的泗河特大桥梁建设，两座连山，全长17.85公里。

 他后来知道说，京沪高铁是中国水电人第一次涉足高速铁路的建设。

 “高铁的起步，是将所谓‘前方’和‘后方’剥离。

 正如在此情势下，加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的背景，十四局当时不得不单枪匹马闯进这一行业，”十四局“放开”的策略，要因地制宜中脱颖而出。

 “鲁布革”时代，鲁布革冲击了十四局内部存在的大问题之一，是企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奉行“企业办社会”困局，作为一个本来应该人才精干、行动敏捷、技能娴熟、资源配置恰当的施工队伍，应该分前而后，不能拖家带口，拖累效率。

 2000年1月28日中午，十四局已经先行归还资源和人员机构，将水电局的一、五、六公司合并成立了大埋分公司，将在滇东的三、四公司合并成为曲靖分局。

 但这也公司的分离只是在设备、人力资源方面有所优化，但公司的依旧面临水土不服，局长是名符其实的“总统”，什么都得管，不仅要管

 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壮大，还要解决诸如职工家里下水道不通、夫妻不睦、纠缠上访等等难题。大理分局的局长由时任十四局党委副书记、现任水电十六局局长的林文进担任，十四局大理管理部主任任文培讲了“一个小故事”。

 “某职工为自己的事跑来找林局长上访，他一来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林局长就没法办事，只能听他叨叨，后来老这样，局长头疼了，听说这位职工又来了，他就一溜烟儿闪了。”

 “杜文裕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不是大埋分局的特例，而是整个十四局的共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十四局那说发展，能存活就不行了。”

 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问题被时任局领导意识到非改不可了。

 2000年1月，十四局分别在大理、曲靖、昆明设立了劳务中心和离退休管理中心，同年4月，设立了大理曲靖培训基地。

 这一举措，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关系，使生产经营和社会职能彻底分离，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

 2007年2月，再次对社会职能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撤销属于相关部门的社保中心和昆明、曲靖、大理的离退休管理中心和劳务中心，成立昆明、曲靖、大理3个管理处，统管所有后方事务，再次减少后方管理人员56。”

 全局人员，除少数教育、卫生人员外，其余的均进入劳务管理中心(管理)，项目部自用人员则根据自己的需求，从劳务中心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

 昆明管理处有工作人员31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3992名；曲靖管理处工作人员56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2.9万人；大理管理处工作人员

 陈益才说，鲁布革“后鲁布革”时代，他和是十四局这两段历史史之以千计职工中的创造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之一。

 现任曲靖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翟永生至少从2008年参加京沪高铁建设以来，翟永生也没干过本行(水电)了。

 “2008年1月，我们进驻山东京沪高铁，驻扎在曲阜林林上。”

 当时翟永生担任京沪高铁十四局二区党委副书记，十四局承建曲阜段的泗河特大桥梁建设，两座连山，全长17.85公里。

 他后来知道说，京沪高铁是中国水电人第一次涉足高速铁路的建设。

 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壮大，还要解决诸如职工家里下水道不通、夫妻不睦、纠缠上访等等难题。大理分局的局长由时任十四局党委副书记、现任水电十六局局长的林文进担任，十四局大理管理部主任任文培讲了“一个小故事”。

 “某职工为自己的事跑来找林局长上访，他一来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林局长就没法办事，只能听他叨叨，后来老这样，局长头疼了，听说这位职工又来了，他就一溜烟儿闪了。”

 “杜文裕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不是大埋分局的特例，而是整个十四局的共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十四局那说发展，能存活就不行了。”

 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问题被时任局领导意识到非改不可了。

 2000年1月，十四局分别在大理、曲靖、昆明设立了劳务中心和离退休管理中心，同年4月，设立了大理曲靖培训基地。

 这一举措，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关系，使生产经营和社会职能彻底分离，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

 2007年2月，再次对社会职能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撤销属于相关部门的社保中心和昆明、曲靖、大理的离退休管理中心和劳务中心，成立昆明、曲靖、大理3个管理处，统管所有后方事务，再次减少后方管理人员56。”

 全局人员，除少数教育、卫生人员外，其余的均进入劳务管理中心(管理)，项目部自用人员则根据自己的需求，从劳务中心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

 昆明管理处有工作人员31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3992名；曲靖管理处工作人员56人，管理服务各类职工2.9万人；大理管理处工作人员

 陈益才说，鲁布革“后鲁布革”时代，他和是十四局这两段历史史之以千计职工中的创造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之一。

 现任曲靖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翟永生至少从2008年参加京沪高铁建设以来，翟永生也没干过本行(水电)了。

 “2008年1月，我们进驻山东京沪高铁，驻扎在曲阜林林上。”

 当时翟永生担任京沪高铁十四局二区党委副书记，十四局承建曲阜段的泗河特大桥梁建设，两座连山，全长17.85公里。

 他后来知道说，京沪高铁是中国水电人第一次涉足高速铁路的建设。

 “高铁的起步，是将所谓‘前方’和‘后方’剥离。

 正如在此情势下，加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的背景，十四局当时不得不单枪匹马闯进这一行业，”十四局“放开”的策略，要因地制宜中脱颖而出。

 “鲁布革”时代，鲁布革冲击了十四局内部存在的大问题之一，是企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奉行“企业办社会”困局，作为一个本来应该人才精干、行动敏捷、技能娴熟、资源配置恰当的施工队伍，应该分前而后，不能拖家带口，拖累效率。

 2000年1月28